

涵芬楼影印《道藏》始末考^{*}

尹志华

以往学界关于涵芬楼影印本《道藏》的问世过程，主要是依据丁福保的《道藏精华录绪言》，以时任大总统徐世昌为首倡者。本文经过考察认为，傅增湘和张元济才是推动重印《道藏》的核心人物。傅增湘作为著名藏书家，从版本目录学的角度看到了《道藏》所收经籍的重要价值，因而向张元济提出重印《道藏》的倡议。张元济作为商务印书馆的主事者，基于爱国情怀，为避免外国人抢先重印《道藏》，于是积极响应。徐世昌支持此事，并以个人入股方式出资襄助。影印过程遇到了很多困难，但正式发售后，150部《道藏》在三年时间内即销售一空。

关键词：道藏 影印 涵芬楼 傅增湘 张元济

作者 尹志华，1972年生，哲学博士，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副教授。

20世纪20年代，上海商务印书馆以其图书室“涵芬楼”名义影印出版明正统《道藏》和万历《续道藏》合集，乃道教经典传播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。正如卿希泰先生主编的《中国道教史》第四卷所言，明版《道藏》的影印行世，改变了长期以来《道藏》数量既少，而又深藏宫观、鲜为人知的状况，从而吸引了学术界的注意和兴趣，此后道教研究成果逐渐丰富起来。^①但是，关于涵芬楼影印本《道藏》的问世过程，学界却极少关注。关于此事的发起人、主持者，曾经流传着一些不准确的说法。学界主要是沿用丁福保（号守一子，1874-1952）在《道藏精华录》中的有关说法，然而丁氏的说法却有很大的问题。近年来已有一些学者作了新的探讨，但关于涵芬楼影印本《道藏》问世的艰难历程，仍有进一步考察的必要。

丁福保编纂《道藏精华录》，时在1922年初。当时商务印书馆虽然已经决定重印《道藏》，但尚未开印。丁福保在《道藏精华录绪言》中说“民国七年（1918），高邮王丹明先生拟借上海白云观《道藏》，集费而重刻木板，惜仅刻成目录一卷，因集费未成，不克举办。今大总统东海徐公（即徐世昌，1855-1939），借北京白云观《道藏》，缩为石印六开小本，每梵本二叶并为一叶，始将梵本改为方册本，每部实价八百银圆，请前教育部总长傅沅叔（即傅增湘）先生总理其事，于是学道者始得饱读全藏矣，其功德讵有涯涘欤！”^②丁氏将影印《道藏》归功于徐世昌，既可能是误读商务印书馆重印《道藏》预约启事所致，也可能有“颂圣”因素在内。而其所言“每部实价八百银圆”，也不是准确的（详后）。

* 本文在资料积累和写作过程中得到了笔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“清代诗文集集中的道教资料汇纂与研究”（18BZJ044）的支持。

① 卿希泰主编《中国道教史》（修订本）第四卷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，第469页。

② 丁福保编《道藏精华录》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，第9页。

丁福保的说法曾长期被学界沿用。如陈国符先生《道藏源流考》，即据《道藏精华录》，称涵芬楼版《道藏》系民国初年徐世昌借北京白云观《道藏》重印。^①施舟人在《道藏通考》的《总论》中也说，1919年“五四”运动后不久，徐世昌总统就首倡重印明《道藏》，他资助付印，并令教育总长傅沅叔主持此事。^②

实际上，关于重印《道藏》之事，徐世昌在撰于1928年的《白云观碑记》中明确地说：“观有明《正统道藏》，门人傅增湘商住持陈明霁（1854—1936），景印流传，余力助其成，曾为之序。”^③近来一些学者据傅增湘书信及张元济日记，也否定了徐世昌发起影印《道藏》之说，但他们或主张傅增湘是影印《道藏》的发起人和推动者，或主张影印《道藏》是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策划的系列影印出版传统经典计划之一。^④对此问题，笔者经过考察认为，傅增湘和张元济同为推动《道藏》影印的核心人物，谁最早提出并不重要，需要关注的是影印《道藏》所经历的艰难历程和傅、张二人的迎难而上、坚持不懈。

傅增湘在1935年9月20日致张元济等人的信中，明确说自己昔年“创议影印《正统道藏》，历时四载，奔走南北，譬解疏通，乃得定义，〔北京白云观〕允假出照印”。^⑤但张元济在1929年致孙玉仙的信中则说，影印《道藏》为其在商务印书馆时所主张，“意在存古，不在于布教”。^⑥也许，傅氏最早提议，随即得到了张元济的附和。傅氏提议固然重要，若无出版公司响应，终成泡影。

在此先对傅增湘和张元济二人作一简要介绍。

傅增湘（1872—1949），字叔和，号沅叔，别署双鉴楼主人、藏园居士，四川江安人。著名藏书家、版本目录学家。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）进士，授翰林院庶吉士。1902年入袁世凯幕府。1903年授翰林院编修，充顺天乡试同考官。后兴办女子教育，曾任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和京师女子师范学堂总理。1908年任直隶提学使。1911年6月，学部奏设中央教育会，与张元济同任副会长（会长为张謇）。1914年3月当选约法会议议员，8月任肃政厅肃政史。1917年12月，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。1919年“五四”运动期间，因反对镇压学生和拒绝罢免蔡元培北大校长职务而愤然辞职。1925年担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。自卸任教育总长职务后，傅增湘潜心于古籍寻访、收集，致力于版本目录学研究，并推动珍稀古籍的重印出版。^⑦

张元济（1867—1959），字筱斋，号菊生，浙江海盐人。近代杰出的出版家、教育家、爱国实业家。光绪十八年（1892）进士，授翰林院庶吉士。历任刑部贵州司主事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等职。1898年维新运动期间，在京创办通艺学堂，受到光绪皇帝召见。变法失败，被革职。次年，因李鸿章推荐，盛宣怀邀其到上海主持南洋公学译书院。1903年进入商务印书馆，任编译所所长。1916年任该馆经理，主持全面工作。1920年改任监理。1926年辞任监理，被公

① 陈国符《道藏源流考》（新修订版），中华书局2014年版，第147页。

② Kristofer Schipper and Franciscus Verllen ed. *The Taoist Canon: 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*, Chicago and London: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, 2004, p. 40. 施先生在此文中误将“五四”写成 May Fifth（“五五”），并将傅增湘的卒年误为1939年，实际上应为1949年。

③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《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》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，第95册第130页。

④ 参见陈晓维《商务印书馆旧档漫谈之一——涵芬楼影印〈正统道藏〉二三事》，载陈晓维著《好书之徒》，中华书局2012年版，第146—158页；黄剑《张元济与〈正统道藏〉重版》，载《现代哲学》2017年第3期；肖伊绯《傅增湘与〈道藏〉影印》，载《中国道教》2018年第2期。

⑤ 转引自陈晓维《商务印书馆旧档漫谈之一——涵芬楼影印〈正统道藏〉二三事》，载陈晓维著《好书之徒》，第147页。陈书误“照印”为“照片”，兹据该书所附傅增湘原函改正。

⑥ 《张元济全集》第1卷“书信”，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，第516页。

⑦ 参见傅增湘《藏园居士六十自述》，载《天津文史资料选辑》1996年第4辑，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，第64—78页；孙英爱《傅增湘年谱》，河北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。

推为董事长，不再负责具体事务。在张元济主管商务印书馆期间，该馆发展成为我国最大的出版企业，出版物遍及教科书、辞典工具书、中外名著、期刊、古籍等多个门类，享有盛誉。^①

傅增湘与张元济曾于1911年6月同任中央教育会副会长，7-8月连续开了十余次会议，应该过从甚密。^②辛亥革命发生后，当年12月，傅增湘参加唐绍仪议和团南下上海，即专程拜访张元济。^③张元济委托傅增湘为涵芬楼收购古籍，此后二人经常通信。傅氏在何时向张元济建议重印《道藏》，笔者未能确考，但至迟在1918年3月11日，二人已开始商量重印《道藏》之事。3月11、14、20日，张元济连续给傅增湘写了三封信，都涉及影印《道藏》的办法。^④傅增湘的提议为何能得到张元济的积极响应？商务印书馆调整出版策略，由主打教科书转向兼顾翻印经典善本，当然是最重要的背景。张元济本人因受刺激而油然而生的民族自尊心，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。据张元济日记，1917年2月19日，张元济持岑春煊（1861-1933，清末民初政坛名人）介绍信往访寓居上海的犹太富商哈同（Silas Aaron Hardoon, 1851-1931），希望对方能帮助承印《四库全书》（因国内厂商尚缺大宗印刷能力）。哈同让其管家姬觉弥（字佛陀，1885-1964）与张元济商谈。张元济的感觉是，此人已完全站在洋人的立场，“高言我处相距太远，校印人不愿”。更让张元济吃惊的是，姬氏表示，他们准备印《道藏》和《四库未收书》。也许姬氏只是大言，但明显让张元济感受到了影印本国传统经典的迫切性，否则又落在外国人后面了。^⑤在此之前，他听说哈同将筹印《四库全书》，即认为“此书为我国文化之宝藏，不宜由外资印行”，表示“商务愿引为己任”。^⑥因此当傅增湘提议影印《道藏》时，张元济马上就产生了共鸣，连复数信商量具体办法。

商务印书馆毕竟是企业，要盈利，因此张元济与傅增湘一直在协商，如何使影印《道藏》既有社会效益，又有经济效益。鉴于傅增湘当时担任教育部总长，张元济希望傅增湘动用人脉关系，组织一批社会知名人士任发起人，并发动有钱人为影印《道藏》入股。因此，张元济积极关注当时的政局变化。1918年3月22日，段其瑞复任国务总理。3月26日，张元济致信傅增湘，即谈及“合肥（指段其瑞）复出，报称阁员极少更动，又谓公（指傅增湘）仍留部，其言想确，则影印《道藏》事仍可进行也”。^⑦3月29日，张元济又致信傅增湘，担心时局变化，明言，影印《道藏》一事的“定约、备案、发起招股，最好乘公在职之日，省事许多”。^⑧

按照张元济和傅增湘的设想，鉴于商务印书馆在上海，而上海白云观就有一套《道藏》，因此拟就近借上海白云观的《道藏》作为影印底本。虽然二人跟上海白云观素无往来，但由于上海白云观是北京白云观的下院，因此他们拟通过北京白云观方丈居中牵线协调。傅增湘是徐世昌的门生，而徐世昌崇信道教，是北京白云观的大护法，与该观方丈陈明霏稔熟。傅增湘大概也曾陪同徐世昌到白云观瞻礼。遂由傅增湘出面，与陈明霏接洽。傅增湘在1940年为北京白云观住持安世霖编撰的《北京白云观全真道范》作序时即回忆说“余自桑海以来（指清朝灭亡，进入民国），游涉郊垌，时往（白云观）瞻礼。嗣以重印《道藏》全经，与前方丈陈君过从渐密。经营三载，苦心毅力，同排浮议，卒底于成。玉笈金函，流传薄海内外，真詮秘典，因之大彰，此

① 参见张人凤、柳和城编著《张元济年谱长编》（上卷）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《张元济全集》第1卷“出版前言”。

② 张人凤、柳和城编著《张元济年谱》（上卷），第325-338页。

③ 同上，第348页。

④ 《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牘》，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，第72页。

⑤ 《张元济全集》第6卷“日记”，第158页。

⑥ 丁英桂《商务印书馆与〈四库全书〉》，载《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》，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，第142页。

⑦ 《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牘》，第72-73页。

⑧ 同上，第73页。

正道教振起之机，不徒为本观中兴之绩也。”^① 傅氏此言既透露出影印《道藏》之事历经艰难，又为曾出力推动此意义重大之事而自豪。

1918年5月中旬，为协调借印《道藏》事，北京白云观陈明霁方丈赴沪。5月18日，张元济往上海白云观拜访陈明霁及该观监院阎雪筠（道名仁爱，全真华山派道士）。陈氏积极支持，但阎氏“意似稍阻”，谓须与本观董事陈作霖（字润夫）和葛晋康（字虞臣）商量。5月24日，张元济约陈、阎二人在“一品香”吃饭，以联络感情。5月28日，陈明霁告知张元济，阎雪筠听从董事陈、葛二人指使，托言请假，避而不见。陈氏此行协调无果，甚为懊丧，遂对张元济表示，如果上海白云观不愿借《道藏》，将来可以借北京白云观的《道藏》。^②

不过，张元济跟上海白云观还是谈成了一件，就是在该观清点《道藏》的页数。张元济在6月4日致傅增湘的信中说，《道藏》页数已经全部数定，每页20行，约近10万页。^③

张元济了解到上海白云观实际掌控人为陈、葛二位董事后，便直接与二人接洽。陈、葛二人同张元济虚与委蛇，“云俟阎某归沪商定”。张元济一时搞不明白，究竟是陈、葛二人有“揽权及鬻利之意”，还是阎某“别有所欲”。面对困局，张元济希望由地方长官出面疏通关系。他听说时任淞沪护军使卢永祥（1867-1933）极为赞成影印《道藏》，便给傅增湘写信，请其以教育总长的身份给卢永祥发公函，请卢永祥出面劝阎某同意借《道藏》。^④ 不知傅增湘是否给卢永祥写了信，总之卢永祥并未出面促成此事。

8月6日，张元济与傅增湘一同赴北京白云观拜访陈方丈，谈借上海白云观《道藏》事，也没有结果。张元济又提出，能否将北京白云观的《道藏》运到上海。如果担心运输安全，可以作为官事办理，沿途派官员保护，或者由白云观派人护送。陈方丈不想将该观《道藏》运到上海，便对张元济说，他已于20天前写信给上海白云观陈董事，请再等候10天，如果陈董事回信不同意借《道藏》，他再写一封信去劝说。张元济说，如果陈方丈真有办法，可再函商，如果只是说空话，不如就在此商定，不必再给上海白云观写信。陈方丈听后默不作声。14日，陈方丈拜访张元济，带来了上海白云观陈、葛二位董事的复信。此信的内容，从张元济21日的日记可以推测出，其中讲了上海白云观有墙壁倒塌，正拟重修，希望商务印书馆资助。陈方丈请张元济代拟致陈、葛二人的回信，张元济建议给阎监院也写一封信，陈方丈表示同意。21日，教育部秘书徐鸿宝（字森玉，1881-1971）拜访张元济，告知已将复信交给陈方丈誊写。对于上海白云观提出的修墙费用，张元济认为工程不大，不过数百元，商务印书馆可以代为修缮。关于给京、沪两处白云观的津贴，张元济曾与傅增湘商定，拟在每部《道藏》定价上加20元，给两观各赠10元。当日，张元济还拟成承印《道藏》契约，送给傅增湘看。23日，张元济收到傅增湘的来信，傅增湘认为，借《道藏》之事须托江朝宗（字宇澄，1861-1943，民国时期著名政客）出面。江朝宗也是北京白云观的大护法，但其时在西山养病，行踪不定，傅增湘建议先等待。^⑤ 10月3日，张元济致信傅增湘，言“借《道藏》事屡促无回音，真闷损人”，询问“江君（即江朝宗）曾与陈方丈细谈过否”。^⑥ 10月18日，张元济再次询问傅增湘“京观陈方丈不知有无要求？江宇澄已否与之谈过？”^⑦

张元济回沪后，多次拜访上海白云观陈、葛二位董事，终于弄明白二人有居奇之意，想让商

① 《前教育总长傅沅叔先生序》，载《北京白云观全真道范》，北京白云观藏本。

② 《张元济全集》第6卷“日记”，第361-363页。

③④ 《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牘》，第75页。

⑤ 《张元济全集》第6卷“日记”，第390、393、394、395页。

⑥ 《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牘》，第82页。

⑦ 同上，第85页。

务印书馆支付大笔费用。张元济推测，由于陈董事曾经也做过书商，“以为石印书籍必有千百部之销路，故欲借此居奇”，因此，他们托称“该观正拟募资兴修殿宇，如能捐助巨工，便是护法，诸事都易商量”。而商务印书馆同人商议的结果是，“至多不能逾千元，且须分期交付，以免中途变卦”。张元济甚至认为，陈董事“有同业相忌之意，又不仅在募捐耳”。^①

让张元济稍感宽慰的是，9月24日，来中国收购典籍的美国国会图书馆代表施永高（Walter T. Swingle, 1871-1952）告诉他，“如印《道藏》，美国约可销数部”。^②

与上海白云观多次协商无果，张元济又想到请地方长官出面。11月20日，他打听到卢永祥其时正在北京，于是写信询问傅增湘“公能挽其出为说项否？”他甚至认为“惟此一着，或可有效，否则此事恐无观成之日”。^③未知傅增湘是否找过卢永祥，但他提出了以官府施压的建议。张元济只是希望有官员出面撮合，并未有以官府压人的想法，因此给傅增湘回信说“同人之意，以为官力一层断不宜用。”之所以不愿以官力压人，张元济等人还有一层想法，就是对《道藏》的销路情况心中没底。如果以官力强压上海白云观借出《道藏》，“而我处发售预约万一不能满额，则仍不能印行，不免贻人话柄”。^④

上海白云观不同意借《道藏》，影印《道藏》之事一时陷入了僵局。张元济后来记述其时的感受是，影印《道藏》事为陈、葛诸人所阻，忿恨已极。^⑤傅增湘提议借北京白云观的《道藏》。张元济回信说“在京影照匪独费巨，且手续甚繁，需时过久，同人仔细筹思，颇多望而却步也。”张元济认为，如果不能跟上海白云观谈妥，就不能先发预售启事。^⑥

在影印全部《道藏》之事一时难以有进展的情况下，傅增湘提议抽印其中部分经书。1919年2月6日张元济回信称“尊意欲抽印，未知拟抽若干种？如工事与《四部举要》无妨碍，弟亦甚愿为之。”^⑦抽印先要选定书目，亦非易事，故傅增湘迟迟未予回应。^⑧不过，张元济也未放弃影印《道藏》的计划，4月17日他给傅增湘写信，仍询问“《道藏》事如何，有办法乞示下”。^⑨

虽然与上海白云观商借《道藏》一事尚无进展，但张元济一直在为《道藏》的印刷和发行做准备。当时，商务印书馆已经决定出版《四部丛刊》（原名《四部举要》）。1919年3月10日，张元济与同事鲍咸昌（字仲言，1864-1929，商务印书馆创办人之一）商量，认为根据当时的印刷能力，可以同时开印《道藏》和《四部丛刊》，遂致信同事高凤谦（字梦旦，1869-1936），“谓两事并举，尚无不可”。5月5日，张元济与诸位同事商量两套丛书出版事宜，分别确定了负责人。次日，同事包文信提交了出版两套丛书的工程预估单，认为《道藏》石印约十万页，与《四部》同印，约廿八个月印完。8日，法国汉学家伯希和（Paul Pelliot）至沪，张元济约见，伯希和表示，拟订购《道藏》和《四部丛刊》各一部。^⑩

傅增湘在教育总长任上，积极争取将影印《道藏》列为政府资助项目。他自述“惟《正统道藏》，玄秘之渊，志在扬阐。余长部日，频议不谐，卒赖东海徐公之力，幸完始愿。”^⑪这段

① 《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牘》，第85、87页。

② 《张元济全集》第6卷“日记”，第411页。

③ 《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牘》，第87页。

④ 同上，第89页。

⑤⑦ 同上，第95页。

⑥ 同上，第87、89页。

⑧ 据张元济书信，直到1923年9月，傅增湘才将选出的《道藏》单行本清单交给张元济。（《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牘》，第111页。）

⑨ 《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牘》，第97页。

⑩ 《张元济全集》第7卷“日记”，第37、63、64、65-66页。

⑪ 傅增湘《藏园居士六十自述》，载《天津文史资料选辑》1996年第4辑，第76页。

话透露出，他的提议遇到了很多反对意见，最后在时任大总统徐世昌的支持下才定下来。现在所见教育部给大总统的呈文记述了傅增湘所做的努力：他“与各阁员筹议，拟具办法，开摺面陈，蒙大总统批示助款五千元，以资提倡”。他力陈《道藏》的学术价值“其中所收唐以前古书，多世不经见之本，不独宗教专门，尤为后来学术考证家所珍重。”他指出，影印出版《道藏》乃抢救古籍之迫切举措“明代刊板，旧在大光明殿，经庚子乱后尽毁。各省道观间有藏本，率已零残，惟京师白云观独存全部，上海有白云观之分院，所存亦多阙卷。仅此孤帙留遗，倘及今不为设法传布，必致终归湮没。”他拟订的影印办法是“依原本缩印，以四半叶为一叶”，“先向上海白云观取印，再就京本补其不足”，“约三年内印成”。计算下来，全藏共十五万三千二百三十七页，约装二千册。经商务印书馆估计，用连史纸石印百部，工料费约五万四千元。再加上津贴京沪两观及杂费约六千元，合计六万元。傅增湘提出，“此项经费，必须预为筹垫，方可着手办理”。经傅增湘动员，财政、内务、农商、交通等部共认垫款四万三千元，尚缺一万二千元。他又提出“依照印书常规，应先发一半工费，印书及半，再行续发全价。一面即印行预约券，每部定价六百元为率，以便随时售书归款。”^① 1919年4月25日，张元济收到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“京华印书馆”经理孙壮（字伯恒）的来信，获知政府已决定印《道藏》。^②

在傅增湘于1919年五四运动中辞去教育总长职务后，主持教育部工作的教育次长傅岳棻继续为影印《道藏》事项争取经费。9月30日，教育部为酌拟印行《道藏》办法正式向大总统呈文。呈文中除叙述傅增湘以前所做工作和所拟办法外，又提出“此次经与阁员会商，复由陆军部认定垫款五千元，海军部认定垫款三千元，外交部认定京钞五千元。拟俟此项垫款收足半数，即汇沪，开始刊印。特将经过情形及拟订办法呈请鉴核，伏候批示。”^③ 10月7日大总统徐世昌批复“呈悉，此令。”^④ 对教育部拟订的办法，徐世昌未置可否。

张元济得知教育部已将影印《道藏》立项后，在8月28日复孙壮的信中说“教育部既有印《道藏》意，无论如何本馆总当表示愿为承办之意。”^⑤ 12月，教育部秘书徐鸿宝来看涵芬楼藏书，张元济将承印《道藏》合约稿交给他，徐氏建议将合约中的预付款改为二万元。^⑥

1920年，商务印书馆多次开会讨论重印《道藏》事，但没有什么进展。1921年9月21日，傅增湘致信张元济说，只能从北京白云观借《道藏》影印，而且拍照必须在北京进行。^⑦ 这意味着借上海白云观《道藏》之事彻底告吹。次日，张元济核查傅增湘以前寄来的印《道藏》公启，发现版面计算有问题，依每页20行计算，页数要比以前预估的多出一半有余，工料费要增加一万至三万元。24日，张元济拜访傅增湘，“告以《道藏》须复查页数”。^⑧

1922年，影印《道藏》事进入了实质推进阶段。傅增湘草拟了《重印正统道藏缘起》。《缘起》主要从文献学的角度肯定《道藏》的价值：一是《道藏》所收地志传记及医药占卜之书，“或出晋宋以前，或为唐人所撰，清代《四库》既未甄收，藏书家亦鲜传录”；二是《道藏》所收先秦诸子书，“半据宋刊、金元专集，尤多秘籍，乾嘉学者研索及斯，只义单

① 《教育次长代理部务傅岳棻呈大总统为酌拟印行道藏办法祈鉴文》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《北洋政府公报》，第1317期，上海书店1999年版，第148册第124页。此呈文所述前期工作，均为傅增湘任内所为。

② 《张元济全集》第7卷“日记”，第58页。

③ 前引《教育次长代理部务傅岳棻呈大总统为酌拟印行道藏办法祈鉴文》。

④ 《大总统指令第二千四百八十号》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《北洋政府公报》，第1320期，第148册第169页。

⑤ 《张元济全集》第7卷“日记”，第116页。

⑥ 同上，第159页。

⑦ 同上，第265页。

⑧ 同上，第266页。

辞，珍俾星凤，采辑未竟，有待方来”。因此，该文表明重印目的是“深惧古籍就湮，幽途终秘，因议重印，用广流传”。《缘起》最后突出徐世昌对重印《道藏》的贡献“东海徐公慨出俸钱，成斯宏举。”^①丁福保将重印《道藏》归功于徐世昌，可能也是受这份《缘起》的影响。

那么，徐世昌为重印《道藏》垫付了多少钱呢？傅增湘在重印《道藏》发售预约后致卢弼（字慎之，1876-1967，曾任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长）的信中说“蒙徐前总统慨垫三万元”^②后来在1939年致张元济等人的信中又说是二万五千元。^③可能后者是准确的数字。不过徐世昌只是垫付资金，相当于入股性质。其中部分资金以10套《道藏》抵扣，另外的资金则视销售情况分红。^④

最后，为什么要徐世昌个人出钱，才能凑齐启动经费呢？前面提到的教育部呈文不是说已有多个政府部门认定垫款了吗？可能这些垫款最终都没有落实。

傅增湘又请人将重印《道藏》启事翻译成英文，并寄给了张元济。张元济在8月19日致傅增湘的信中说“影印《道藏》英文启亦已奉到，据同人阅称，谓原译不甚妥协，如周秦诸子竟误认为周姓、秦姓诸君。此外亦尚有必须修改者，已嘱赶办。”张元济在信中还讲了几件事：一是《道藏》目录已经印出；二是已安排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做好拍照等准备工作；三是请北京分馆同事速商白云观方丈，将该观收藏的《道藏》残本运到上海。^⑤8月28日，张元济致信傅增湘，告知在财政总长董康来沪时，已将100份《道藏》样本附英文《缘起》交给他，托其分发，另已邮寄10份给傅增湘。张元济在信中询问“前函拟先借白云观所藏残本，运至上海，编定目录，寄至京华印书馆，再向该观按目借出开照，免致错乱，此事白云观是否已同意？”^⑥9月9日，张元济从傅增湘的回信中得知，“《道藏》残本陈道人忽有怀疑”，此事只好作罢。他请傅增湘转告陈道人，影印《道藏》之事，已确定“在京照相，转寄上海制版”，因为“运纸入京税重，装订本子工人不敷，均不能不就上海办理也”。^⑦

在8月19日致傅增湘的信中，张元济还透露了一个情况“一年以来，南北学佛诸子怱怱敝处影印续释藏经，并以宏法大愿广为说法，认购者亦已剧数十部，责望甚切，敝处业已允从，将于来月发售预约。”张元济所说的“影印续释藏经”，即影印日本京都藏经书院刊行的《卍续藏经》。张元济担心，由于“道家势力似不如佛”，如果两套丛书同时发售，《道藏》“所有销路恐不免被其侵占”。也有人告诉他，“释道两教截然不同，销送各殊，不至遽有妨碍”。张元济认为“究竟如何，殊难预测”，于是请傅增湘“代为察度”。张元济说，如果傅增湘“以为无碍，自当同时发布，否则宁迟毋速”。张元济一直担心《道藏》销路不畅，他在信中对傅增湘说，“此书

① 见涵芬楼影印本《道藏》卷首。

② 转引自肖伊绯《傅增湘与〈道藏〉影印》，载《中国道教》2018年第2期。

③ 转引自陈晓维《商务印书馆旧档漫谈之一——涵芬楼影印〈正统道藏〉二三事》，载陈晓维著《好书之徒》，第148页。

④ 1924年1月27日张元济致信傅增湘说“东海（指徐世昌）自留《道藏》十部，已遵嘱寄津。”1926年除夕傅增湘致信张元济等人说“《道藏》东海定款望早付清。”张元济过问，丁英桂于1927年1月20日致信张元济说“东海《道藏》帐所存定洋七千余元，已于十六年一月十一日知照会计科，收京馆帐划交。至余利书之分配尚须待傅君续示办法。”1927年傅增湘又致信张元济说“《道藏》分配利息及余书，盼告梦旦早寄下，东海催促多次也。”可知徐世昌出资属入股性质。（《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》，第115、140、146、183页。）

⑤ 《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》，第98页。按：北京白云观除有一套完整的《道藏》外，还有一些零散的《道藏》经卷。

⑥⑦ 同上，第99页。

预约含有孤注之势，若一发不中，我公责任固重，敝处亦措置较难，故不能不慎之于始也”。^①傅增湘的回信笔者未见，但可以推测的是，他对《道藏》的销路持乐观态度，并以此来鼓励张元济，最后的结果是商务印书馆在1923年同时启动了《道藏》和《正续藏经》的重印工作。

傅、张二人就重印《道藏》的发起人名单进行了多次商议，动用各种关系邀请社会名流加入。最后确定的发起人名单上共有13人，分别是赵尔巽（清末任东三省总督，时任清史馆总裁）、康有为、李盛铎（清末出洋考察五大臣之一，民国成立后历任大总统顾问、参议院参政等职）、张謇（清末状元、近代著名实业家）、田文烈（北洋将领，历任农商总长、内务总长等职）、董康（清末进士，民国成立后历任法制编纂馆馆长、司法总长、财政总长等职）、熊希龄（前国务总理）、钱能训（前国务总理）、江朝宗（曾任北京步军统领）、梁启超、黄炎培（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，创建中华职业学校）、张元济和傅增湘。^②张元济曾邀请罗振玉（字叔蕴，1866-1940）列名发起人，但罗振玉回复说，如果对道教颇有研究的沈曾植（字子培，1850-1922）答应出任发起人，他也加入；如果沈曾植不同意，他也不加入。^③从最后的名单来看，沈曾植可能没有同意，因此他们二人都没有列名发起人。罗振玉又提出邀请王国维任发起人，但张元济回复说“敝处于印行古籍一部分事尚系萌芽，遽延名宿，实增惭愧。顷与敝同人商议，聘请与否一时尚未能定。”^④从最后的名单来看，大概没有聘请王国维出任发起人。

1922年10月，商务印书馆开始散发《道藏》预售启事。^⑤12月14日，商务印书馆在《申报》上刊登重印《正续道藏》的广告。广告中讲了重印《道藏》的缘起，署上了13位发起人的名字。对这套丛书的介绍是：全书约十万页，分装一千二百册，照六开本式，用上等粉连史纸石印，书根上加印书名册数。出版进程是：全书分六次出齐，自1923年10月至1925年6月，每4月出书一次。关于预订：若一次性付款，每部七百二十元；若分三次付款，每次二百八十元。预订截止日期为1923年3月。商务印书馆还为该套丛书配备了书橱，另外计价：櫥木制90元，桧木制66元，是否订购听便。^⑥

关于商务印书馆派人到北京白云观对《道藏》进行拍照的具体过程，笔者目前所见记录甚少。张元济在1923年8月1日致傅增湘的信中抱怨说“白云观道人借书甚不方便，偶然漏照，事所恒有。续往请借，道人即甚为难，殊觉所见不广。”张元济请傅增湘与白云观沟通说明，让白云观予以配合。^⑦

重印《道藏》一事正式启动后，张元济念兹在兹的就是预订数量。1923年2月3日，他致信傅增湘说，《道藏》“推销方法只能专用感情”。他希望傅增湘利用自己的关系积极推销，并叮嘱说“各处如有复信，尚望见示”。他又告诉傅增湘说，董康“昨日遣其随员梁君来访，谓欧美图书馆当有数部可定，此间（指商务印书馆总馆）仅售出一部，各分馆尚未有消息”。^⑧4月15日，张元济致信傅增湘说，《道藏》共售出31部，“但欲印百部，必须售出六十部，否则尚须垫本”。因此，他请傅增湘设法多发出信件，让更多的人预订。他认为，“今之阔人费去数百元，真不

① 《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》，第98页。

② 发起人名单见《重印正续道藏发售预约》，《申报》1922年12月14日第2版。

③④ 张元济1918年6月3日致罗振玉函，《张元济全集》第2卷，第463页。张元济函中所说的“培老”指沈曾植。

⑤ 《本馆四十年大事记》，载《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》，第690页。

⑥ 《重印正续道藏发售预约》，载《申报》1922年12月14日第2版。此发售预约在刊载在《科学》1922年第7卷第10期和《教育杂志》1922年第14卷第12期上。

⑦ 《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》，第111页。

⑧ 同上，第106页。

过沧海之一粟”，只要游说得法，“想此事总不至无希望也”。^①5月23日，张元济致信傅增湘说，《道藏》已经开印，预订数多了5部。对于预订总数，他降低了目标，不再提60部，而是希望能售出50部。为了达到这个目标，他在信中请求傅增湘“鼎力吹嘘”，即为《道藏》多做宣传。^②

傅增湘为增加《道藏》征订数量，确实在不遗余力地动用各种关系。从傅增湘的一封书信即可见一斑。此信系写给著名藏书家卢弼的。傅增湘在信中说“京师白云观《道藏》为海内孤帙，古本秘籍多世不经见之文，曾经教育部呈准影印。嗣蒙徐前总统慨垫三万圆，交增湘付商务印书馆印行。现在影印开始登报发售预约，亮荷鉴及。惟是书卷帙浩繁，印行仅以百部为限，因念台端耽研典籍，素广搜罗，倘承推爱，酌量购置，俾广流传，高谊雅怀，同深企仰。附呈书目四册，样本一册，并希察存如荷。订购敬祈按预约办法将款汇交该馆，或逕交敝处代为转交亦可。统希酌察办理为幸。”^③面对同为藏书家的朋友，傅增湘力陈《道藏》版本价值高，印数又很少，因此值得购买。

傅增湘的推销确实有成效。1923年8月1日，张元济致信傅增湘说“敝处实销，连尊处代招已购各户在内，共得六十部。私冀全书告成之日，可望售去八十部。如此时局，如此书，可谓有成绩矣。”这样，张元济原来设定的预订60部的“保本”目标已经达到，于是他转而关注印刷问题，希望当年十月出版第一期的承诺“不致失约”。^④10月23日，张元济致信傅增湘说“《道藏》预约共售出六十三部，后半印价当可足用。第一期即日出书，为洞真部，全部共计一百六十四册。依照通告期限出版，并未爽约。”在此信中，张元济还提出，今后如果有人预订，“似应加价”。^⑤

商务印书馆在《道藏》预约发售广告中曾言明出版期限是1923年10月至1925年6月，分六期出版。到1924年6月，开始印第三期时，鉴于《道藏》已售出90余部，商务印书馆觉得《道藏》供不应求，于是决定加印50部。^⑥这样前面的两期就要重新制版，随第四、五期一同印出。^⑦但第四期《道藏》却因“各种耽搁”，到1925年7月仍未能出书。张元济致信傅增湘说明情况，谓因“近两月来，时局纠纷，人心不定，诸事不免停滞”，“此间罢工事至今未了，敝公司所用电力已被租界工部局停止，甚为困难”。^⑧至1926年4月，《道藏》终于全部印完，比原来的预期推迟了将近一年。

据胡道静先生所言，涵芬楼影印本《道藏》缺98页。胡先生认为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，北京白云观《道藏》虽经道光年间修补，但到民国时期又有所残缺，未曾觅补。^⑨笔者推测，也可能是商务印书馆拍照时有所遗漏。

在《道藏》印成之际，傅增湘考虑撰写一篇后跋。1926年5月27日，傅增湘致信张元济：“《道藏》谅印成。鄙撰后跋数日可寄，乞饬知装订稍缓数日，何如？”^⑩但不巧的是，其时张元济已向商务印书馆董事会提出辞去监理职务，并已登报声明，不再管事。《道藏》发行后，张元济才想起傅增湘撰写后跋之事，于是在6月10日致信傅增湘说“《道藏》将印完，弟先离馆，

① 《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》，第108页。

② 同上，第109页。

③ 转引自肖伊绯《傅增湘与〈道藏〉影印》，载《中国道教》2018年第2期。

④ 《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》，第110-111页。

⑤ 同上，第112页。

⑥ 1935年9月20日傅增湘致张元济等人的信，转引自陈晓维《商务印书馆旧档漫谈之一——涵芬楼影印〈正统道藏〉二三事》，载陈晓维著《好书之徒》，第147页。

⑦ 1924年6月30日张元济致刘承干的信中说“《道藏》现正加印”“至第一、二期书，则须重新制版，随四、五两期同出。”（《张元济全集》第1卷“书信”，第433页。）

⑧ 《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》，第120页。张元济提到的“罢工”，即“五卅”运动期间上海工人大罢工。

⑨ 胡道静为文物出版社、上海书店、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联合重印《道藏》所撰《前言》，第5页。

⑩ 《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》，第130页。

竟将吾兄拟撰后跋一事忘却。今已发行，恐无及矣。”^①

傅增湘没有提出补印自己的后跋，但又与张元济商量补印徐世昌和北京白云观方丈陈明霖的序言。徐世昌在位时不仅从政府的立场上支持重印《道藏》，而且个人出资予以赞助，陈明霖慷慨同意借出《道藏》，二人作序都合情合理。1928年3月31日，傅增湘致信张元济说：“《道藏》尚有徐东海序文一篇，原议补印，加入目录之首，此事讫未办（又有陈道士序一篇），请查收两序，速行补印寄京，以便加装入册。”^②不知商务印书馆最后是否补印了两序，也不知两篇序言现在还能否找到。

对于重印《道藏》的纸张和装帧质量，傅增湘也颇为关注。1927年4月26日他致信张元济，指出商务印书馆近来所用纸张头尾厚薄不匀，导致《道藏》和《困学纪闻》两种书在装订上尾低头高，“一尺书差至二寸许，堆案既不耐观，插架更难齐整”。5月10日张元济复信，感谢傅增湘指出问题，使印制工作得以及早改良。^③

《道藏》印完后，销售情况良好。1929年4月29日，傅增湘有一好友欲购《道藏》一部，他遂致信张元济说：“馆中当有存者，可否让与一部？其价记前定一千元，能略加折减否？”^④5月8日，张元济回信说：“代问《道藏》，据查业已无存。”为证明其言并非敷衍塞责，张元济特地附上商务印书馆总务处的函，其中明确说“敝馆整部《道藏》均已完全售出，现所存者均系残片坏叶，补印亦甚费事，不易配成全部”。商务印书馆又告知傅增湘，“去岁曾有一主顾购去后复托转售，第不知现在已否售出，且必须照原价加增四百元”。^⑤可见，《道藏》售罄后，有一些原来的买主见有利可图，便加价转让。

鉴于社会上对《道藏》仍有需求，傅增湘提议再印。1935年9月20日，他致信张元济等人说：“近来中外人士及边远省分向敝处询问者日日不绝。肆间悬千金以求亦不可得。近且有出千五百金者。而在沪、平（北平）两馆来购者亦复甚多。盖此百余部流布后，当世颇知此书之宏富深玄。西洋人尤重之，购求更亟。鄙意为时势之需要及学术之宣扬，此书宜早为重版印行，以副海内之望。拟请贵馆查取昔日合同，急议重印办法。其部数以二百部为限，仍发行预约。其价应酌增若干，以现时工价物料为准可也。至制版，则以原书重照。较初办，自可轻减若干。用款一节，初次由东海垫出二万五千元，目前如再请东海出资，恐亦非易。以彼高年，或不愿分神及此。目前假定开办之始需费三万元，拟由仆与贵馆各认其半。俟预约截止，款项收齐，或赢或绌，彼时再计分担之法或分任拆息亦可。至分配余利，则酌前次合同行之。以鄙意揣之，其有赢无绌，可以断言。缘此次再版，知此书之重要者必多。其订购踊跃必较上次为甚。若加以宣传之力，百余部可以坐致。此等良机，似不可失。敬祈台端会商决定，早日施行。如有未尽事宜或须面议者，鄙人可以来沪陈述，更为妥协也。”^⑥

傅增湘断定再印的销路一定会比初印更好，因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《道藏》的重要性。为了减轻商务印书馆前期投入的压力，他自告奋勇承担一半的启动经费。9月24日，张元济回信说，再印《道藏》之事，待与王云五、李宣龚商量后再奉告。9月28日，傅增湘再次致信张元济，请其考虑重印《道藏》事。10月3日，张元济回复说“属复印《道藏》，已经公司详细

① 《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》，第131页。

② 同上，第187页。

③ 同上，第153页。

④ 同上，第202页。

⑤ 同上，第202-203页。

⑥ 转引自陈晓维《商务印书馆旧档漫谈之一——涵芬楼影印〈正统道藏〉二三事》，载陈晓维著《好书之徒》，第147-148页。

估计，现无存板，仍须逐一照相，所省者不过当时分叶之手续，再四筹画，事恐难行。”^① 张元济又附上商务印书馆关于不能重印的详细说明，主要是成本高，“国内物力艰困，百业凋敝，虽好古多财之士，不能不有所观望”，也就是不看好发行前景。^② 傅增湘仍不死心，又提出“改用铅字排印，可省叶数一半，似可行”。张元济回复说，问题不在纸价之贵，而在制版之难，“制版之费大巨，故其事实不可能”。^③

到了1941年，傅增湘听说日本人要重印《道藏》，又给张元济写信说“〔日本人〕重印《道藏》已出样本，就馆本（指商务印书馆本）缩为两层，且派人来白云观重校。又以日本内阁文库藏正统印本再校，闻纠正谬脱不少。定价只数百元，则我国再版之事无望矣。”^④

1941年，傅增湘在为金刊本《磻溪集》撰跋时，回顾了重印《道藏》的过程，感谢出力的各方人士。他说自己倡议重刻《正统道藏》后，“时时诣长春故宫（即白云观），访观主陈毓坤（即陈明霁），筹商调取藏经，分期影印之策。……其后宗人治芑（即傅岳葵）继掌邦教（指主持教育部工作），东海老人（即徐世昌）慨斥巨贲，森玉（即徐鸿宝）更为奔驰南北，群策群力，奋力辛勤，迄于丙寅（1926年），而全藏经典告成。”^⑤

综上所述，傅增湘和张元济是推动重印《道藏》的核心人物。傅增湘作为著名藏书家，从版本目录学的角度看到了《道藏》所收经籍的重要价值，因而向张元济提出重印《道藏》的倡议。张元济作为商务印书馆的主事者，基于爱国情怀，为避免外国人抢先重印《道藏》，于是积极响应。影印过程遇到了很多困难：首先是上海白云观不同意借出《道藏》，多番协商无果，最后只能远赴北京白云观照相，回上海制版；其次是缺乏启动资金，虽经教育部呈文大总统徐世昌，获政府立项，但经费没有落实，最后是徐世昌个人以入股方式出资二万五千元；第三是预售数量迟迟达不到目标，经傅增湘等人竭力推销，方达“保本”要求；第四是受时局影响，印完全部《道藏》比约定时间推迟了将近一年。但正式发售后，150部《道藏》在三年内即销售一空。傅增湘提议再印，但商务印书馆对市场进行预估后未予认同。可以告慰先贤的是，后来海峡两岸均曾重印《道藏》。1977年，台湾艺文印书馆和新文丰出版公司先后据涵芬楼本《道藏》进行重印。1988年，大陆文物出版社、上海书店、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重印了涵芬楼本《道藏》，并据上海图书馆所藏原上海白云观《道藏》补足了缺页。中国道教协会从1997年开始，组织专家学者，对明代《道藏》进行整理、点校和少量的增补，于2004年出版了《中华道藏》。2016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》将编纂《中华续道藏》列入了文化重大工程中的“中华典籍整理”项目。道教典籍的收集、保存、整理、出版及其数字化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。

（责任编辑：于光）

① 《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牘》，第334、335页。

② 转引自陈晓维《商务印书馆旧档漫谈之一——涵芬楼影印〈正统道藏〉二三事》，载陈晓维著《好书之徒》，第157页。

③ 《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牘》，第338页。

④ 同上，第381页。感谢朱越利先生向日本学界打听1940年代日本重印《道藏》之事，据麦谷邦夫先生回信，傅增湘听到的可能只是传言，目前没有发现日本在1940年代重印的《道藏》。

⑤ 傅增湘《金刊〈磻溪集〉跋》，《藏园群书题记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，第770-771页。